



新观察

文艺繁荣和我们的责任

□张笑天

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是人们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文艺家对生活的解读、反思，对道德、情操乃至人性的艺术的提炼、概括。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有这样一段论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如此？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哉。

我想，在梁启超生活的年代，还没有电影电视，否则这些新的文化传媒也一定会被他列为大家一样的地位。

也正基于此，鲁迅在看到围观斩首示众之麻木国民后，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青年鲁迅认为首推文艺，于是开始提倡文艺运动。

值得欣喜与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但使中国在国力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使中华民族以昂扬向上的健康姿态立于世界之林。这种变化，值得大书特书的比比皆是。以我所生活的吉林省为例，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是吉林的名片，吉林电视剧的蓬勃兴起、吉林文化设施的建设、为打造重点文艺作品扶持力度以及投入的增加，使得吉林的文化呈现出勃勃生机。吉林的

文化繁荣，只是当代中国文化繁荣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个已经年过七旬、走过50年创作之路的作家，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艺的繁荣，得益于文化环境的宽松。有今天这种包容的创作氛围和环境，是文艺家们发挥其聪明才智之源，是创作鼓舞人心、利用利民好作品的关键，这是近年来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举世瞩目的成绩面前，还有提高和改进的空间。当务之急是“让育人者先受教育”。如果说，文艺家是育人者的话，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提高自身素养、加强自身教育的时候了。

首先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问题。大量涌现的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是文学的主流，但不可讳言，也有一些现象值得研究和分析。有的作品解构崇高、颠覆崇高，戏谑人类公德、挑战美好情操和公序良俗，代之以丑陋的人性，甚至是动物性，仿佛这种丑恶的东西才是作家创作的本源和实质，并称之为“回归”。这样的文学已经不是大众文学了，已经背离了教人向善，给人以光明、希望和精神愉悦的使命。

其次是拜金主义的问题。说起文艺界广为诟病的拜金主义，已引起了民众的愤慨。过去我在长影时，拍一部电影，平均周期8个月，剧本确定后，光导演带主角去体验生活就不少于一两个月。他们凭的是一种严肃的创作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人反对明星拿酬金，但一切都为酬金不惜牺牲艺术、丢失人格，且成为青

少年盲目“明星梦”的推手，混淆有偿服务与一切向钱看的概念，这样的现象和导向，如不加以规范，它最大的危害可能是把下一代人美好的追求染上了铜臭。

再次是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回想改革开放之初，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应当说都是伴随着时代脉搏律动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门窗打开，新鲜空气进来，垃圾也飘了进来。一个作家，一旦与时代脱节，就失去了时代精神，必然空虚，文章苍白无力也就是自然的了。有的人，本来是驰骋文坛的现实主义大家，曾几何时，他的作品变成了浮光掠影、轰轰烈烈、无聊的东西，无病呻吟，展示丑陋。他们已失去了对生活的火热情感，用一种灰暗的心态来看待人生。很难想象，这种心态下还能有佳作问世。

面对这些问题，除了作家自身自省、自我净化外，还应有切实的措施。

一是加强文艺批评和大众监督。不能让文艺批评失语。文学的滑落，与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批评的失语是有很大关系的。不是没有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拜倒在世俗脚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研讨会一片吹捧声，买版面自我吹嘘作品。文学的两翼折其一翼不可，两翼俱损，还怎么翩翩腾飞？

二是加强政府引导。作家的神圣使命就是用他的作品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既然好的作家、艺术家是社会进步力量、健康精神的代言

人，就应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反之，则应抵制，这种抵制是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作品不对人。科学界有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对那些德艺双馨的文学家、艺术家，应给予类似的荣誉头衔，他们的优秀作品对国家、民族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三是加强对电视剧拍摄题材的引导。电视剧目前是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艺术，要有一个总体把握，应尽量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了问题才想起补救。清宫辫子戏、言情戏、警匪片、涉案戏、苦情戏之后，最近谍战片也出现了狂轰滥炸的局面，已经编到了再不能离奇的地步了。

四是在开拓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化进程中，保留相当数量的文艺主力军。文艺家有一个教育和引导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义务。当前，与拜金主义相配套的低俗文化在有些地方大行其道，谁反对就被斥为反对大众文化。我们的文艺要设法使受众的欣赏水平、道德取向发生积极变化，这是短时间看不出成效的工程，却是民族兴旺的千秋大计。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小说人物，曾鼓舞了多少青年为理想献身，我们今天的文艺，没理由放弃作品的认识和教育功能。

五是设立国家文艺发展基金。对国家提倡的和有突出贡献的文艺家、优秀作品给予扶持，使之成为与文化市场、文化企业并行的手段，以确保主旋律永远唱响。

关注

何谓好的小说，把这个问题当做“问题”提出，说明曾经不成问题的小说出现了问题。在价值多元和市场导向作用越来越突出的当下，面对文学作品，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知识与经验的全面失效，因而产生一种情感与理智、自我与他者的分裂状态，处在一种无法协调的焦虑与尴尬的境况。就小说来说，一方面是小说创作的发达与繁荣，每年几千部的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的出版与发表使我们出现信息过载和审美疲劳；另一方面是文学的“死亡”。随着新兴电子媒体逐渐取代印刷媒介，文学面临着终结的威胁，影视的收缩更是导致小说的末路。现实社会的状况和小说目前存在的问题，都影响到我们对小说的判断和认知。因此，谈论何谓好小说及文学创作问题，实际上包含了重建共识和再塑文学的意义。

要解释何谓好的小说，首先需要知道何谓文学。实际上，文学的现代含义才不过两百多年，其本身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约翰·艾里斯曾经论证说，“文学”就像杂草一样，杂草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植物，而是只因出于某种想要除掉的任何一种植物。“文学”意味着某种相反的东西：它是人们出于某种理由而赋予其高度价值的任何一种作品。因此，“文学”只是一种功能性的概念，它并不像昆虫存在那样存在着。小说同样如此，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在16世纪末与17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中，“小说”一词似乎同时被用于真实的和虚构的事件。中国小说的观念也经历了由古代的“补正史之余”的真实到现代的“想象性”的虚构的转变过程。不过，正如我们谁也不会把电话簿、菜单、病历当做文学一样，能够当做文学来欣赏的文本一定是可以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所以，乔纳森·卡勒总括以上两种不同的视角指出，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理解成为具有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看做程式的产物，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哪一种视角也无法成功地把另一种全部包括进去。所以你必须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即所谓的文学，就是文本的自身性质和外部对文学的看法、需求、评价这二者复合关系的一种体现。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也应在这两种复合关系中建立自己的边界和存在依据。

所谓好小说的标准，其复杂程度不亚于谈论何谓文学或何谓小说的问题。我们或许以文学经典为标准，认为符合文学经典的从小说为好的小说，但问题是文学经典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异往往大于共同性，依据文学经典进行的写作大都沦为拙劣的模仿而遭遗弃。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不仅蔑视常规，拥有打破常规的创造性和先锋性，而且它在打破文学程式与规则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规则，但这种规则往往也成为另一种文学经典反抗与破除的对象。我们或许以“想象性”的“艺术”作为好小说的标准，好的小说的确是一件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品，但问题是想象性的艺术因素不仅分布在文学的其他种类，而且也散布在诸如历史传记等其他学科中，甚至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可能是违反人性的作品。我们或许以小说的功能如“认识性”、“思想性”、“教育性”作为好小说的标准，好的小说以其深刻的人性内涵和强大的审美感染力在个体意识养成和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功能只是小说艺术本身之外的“无用之用”；若小说直接以这些功能为表现对象，不仅难以成为好的小说，而且恐怕也不成其为小说了。当我们谈论小说的人性光芒和思想力量时，默认的前提条件就是“好”的小说。另外，我们的好小说标准往往被各种小说选本所培养，以至于认为选本、尤其是权威小说选本收集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且不说把我们的主体性赋予少数专家或几个编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反思，选本编者本身的好恶及其多种考量更需要警惕。小说选本节省了我们的劳动，相对于沙里淘金的艰辛我们更乐于接受选本的便捷。正因如此，小说选本的负面作用一如其正面力量一样被放大了許多倍。

正如无法确切定义文学一样，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好的小说。但好的小说一定是创造性的，是一种艺术。它可以容纳以上列举的各种特点，却不被这些特点所限制。好的小说往往在我们作为阅读主体与小说文本的对话中向我们敞开。

书讯

《高官的良心》聚焦体育界反腐打黑斗士

本书的主人公陈培德是浙江省体育局前局长。10年前，中国足球甲B联赛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假球黑哨的肮脏交易。面对这一后来被称为“5·19”的黑哨事件，陈培德挺身而出，在他的努力下，国内掀起席卷全国的足球打假扫黑反贪风暴，媒体因此将他称之为“中国足坛反黑第一斗士”《高官的良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讲述了作为主管体育高级官员在这场反腐打黑的战争中的种种境遇和坚持，讲述行业腐败对健康社会肌体的侵蚀。作者朱晓军以饱满的激情、作家的良知和精彩的故事，呈现了一个当代官员在重重危机中的困惑和突围，彰显了一种官员宝贵的精神资源。

《日落而息》触及时代宠儿灵魂深处的博弈

王多圣的长篇小说《日落而息》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两位主人公，一位是业界巨头，本市支柱企业的老总；一位是政坛明星，这座城市的一市之长。他们是亲兄弟，却疏远多年，从不来往。潜藏污染风险，却回报巨大的项目可否上马，让他们再度成为对手。决定一座城市命运走向的高层博弈正暗展开……从酝酿到最后定稿，作者王多圣历时8年完成的这部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取材当下最敏感、最具时代特质的生活层面，以深刻、恢弘的笔法生动描摹了两位时代宠儿灵魂深处的图景。

(文平)

评 论

清亮真好

——读黄亚洲散文新作 □谢大光

2009年初冬，去闽东北采风，一路和黄亚洲同行，印象最深的是他做事的专注。那一段，他正赶写辛亥革命题材的电视剧，坐上汽车，膝上的稿纸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我喜欢坐在黄亚洲身后看他写作，那真叫文不加点、下笔千言。别看写作时闭目塞听，只要一下车，黄亚洲的感觉器官全打开，眼观耳听手记，不放过任何信息，还不时追向着细节。不知怎么挤出的时间，反正每到晚饭前，像变魔术一样，黄亚洲当天的作品就新鲜出炉了，白天的采风已经酿成优美的散文诗歌。写太姥、写周宁的篇章最初就是在饭桌上听黄亚洲朗读的。那几天，听黄亚洲用抑扬顿挫的“杭普话”朗读新作，成了我们每天期待的节目。很多人赞赏黄亚洲的捷才，以为他的作品都是一挥而就，其实黄亚洲最肯在修改上下功夫，一遍遍地读就是在反复琢磨、修改。我发现，黄亚洲善于捕捉陌生事物给他的第一感觉，在太姥山，他抓住满山石头散漫的生存状态，提炼出“集体遗失”的意象；在九龙漈，他抓住瀑布的动态和轰响，提炼出“九龙呐喊”的象征意味。第一感觉往往是新鲜的，富有推动想象和思考、产生连锁反应的力量，以自己全部的生活体验和饱满的情感去丰富、深化最初的感觉，就有可能敷演出好的作品。第一感觉又是很脆弱的，稍纵即逝，极有可能被趋同的审美定势所淹没，也可能被一般化的语言模糊掉。亚洲的写作始终会紧紧抓住感觉的初始力量，珍惜它的独特，呵护它的新鲜，即使反复修改，也总是在不断强化和擦亮它。我想，这可能是黄亚洲工作效率高的一个因素。归根结底，还是精神的专注在起作用。

《只能抓一把糖给老刘》是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字。这一次黄亚洲面对的是一位上访47岁的老兵，在这里，文字被还原到最初的功能，它可以不借助任何技巧直接感动你。我震撼于47这个数字，震撼于47年执著一件无望之事的老刘，也震撼于容忍了这一切的社会。黄亚洲开始的写作动机可能只是同情。这篇文章写得并不轻松，他没有回避内心的游移和顾忌，甚至揶揄自己的“假惺惺”，但他还是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老刘的遭遇，他还直接向有关方面写信“搬救兵”，希望借助手中的笔能帮老刘不再露宿街头。黄亚洲对老刘说：“我是一个文人，有用的时候很有用，没用的时候真的一点用都没有。”这话听起来有些

心酸，却是实话。也许黄亚洲的文章最终解决不了老刘的问题，但他无意中树起了一面镜子，通过露宿街头讨47年的老刘，照出了方方面面的众生相，也照出了作者自己。黄亚洲的文字从来没有这样小心翼翼，惟恐偏了导向，惟恐读者误读，惟恐伤了对方的自尊。善良有时也会伤人的。随着了解的深入，各方信息的汇聚，黄亚洲逐渐靠近了老刘的内心，这个莫名其妙被中途退伍的老兵要的不是一张床、一个户口，他讨的是公道，是47年来的真实。黄亚洲想当“和事佬”，老刘却讲“原则性”。“他不容我插嘴，他思路清晰，他用一个军人的斩钉截铁的口吻说，他必须坚持他的原则，他没有理由得不到任何一个退伍军人都应该得到的正式退伍手续，以及一个退伍军人应该得到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这些记述中，同情已经更多地转换成敬重。我甚至想，在老刘的固执中，黄亚洲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影子吧。

文章就应该是一面镜子。直露也好，曲幽也罢，总要能照出作者自己的心地才好。写卯节的祭祀，黄亚洲感悟出：“我们是这么强大而又这么脆弱，我们真的需要古老的智慧，我们需要援助，让奇特的文字不要消亡，让灵异的通道不要阻塞，让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歌声能够在今天的地球上持续地响起”；写古村指南，他注意到“两棵并立的死树，挺挺地直冲云霄，枝杈如刀如剑，却无一叶”，“死者都如些不作俗态，何况旁边的生者”；面对玉龙雪山，他浩然发问：“如果不高举锋芒，不树起一根最纯洁最神圣的标杆，你玉龙雪山又何必来到人间？”在标榜“将艳遇进行到底”的丽江，他找到了自己的艳遇：“古镇让人安静，这就够了。在这么一个纷繁芜杂的时代，有什么词汇能比‘安静’这两个字更加鲜艳？”“让生活松弛下来，让生活慢慢地上升到精神的层面，那么，你就是邂逅爱情了。”而到了印度，面对陌生的国度，沉浸在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黄亚洲的文字和他的心胸一样，更为开阔，“我发现这一切都很奇妙，一切也都很和谐”，“每个元素或者说每个系统都在认真地围绕着自己运转，互不理解，互不干涉，也没有互相看不起，一切都被置放在同一个空间，被置入同一个清冽的早晨，这种奇特的镶嵌形成了一首诗。诗都是这样形成的，自然，不经意，长短不齐，但是奇妙。”黄亚洲的笔下还不时出现自嘲的语句：“想我当文学匠，这些岁月，谈稿费一年比一年不含糊，还老是标榜自己从事文学是‘两快哲学’：一为碗筷，二为愉快；如今却在雷锋的氛围中晃晃悠悠，跟这个碰杯，跟那个碰杯，作庄严状，真是‘羞呀么羞煞人’。”凡此种种，不正是一个有良知、重感情、敏而多思、自信自省的作家内心的写照吗？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寸心和千古，这极不对等的两级，必得要依凭坦诚才得以对接。读黄亚洲的文字，总是能摸到他的脉搏，坦诚、爽快、清亮亮的。

步”。这句话用在王雨的《填四川》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小说中的巧合连连，真是让我们惊异不已。但王雨在情节的设置上并不是随意地凭借巧合来解决矛盾，他从常维翰、宁徙夫妇携老带幼踏上填四川的路起，就精心地铺垫起一个个的悬念，为以后的巧合理下伏笔——幼子常光儒被飞人掠走；常维翰打虎又与移民队伍走散，误入孙亮的匪巢。而后常光儒成为了赵家的儿子，直到新婚之夜，宁徙才发现即将成为她的女婿的赵庚弟竟是她失散的儿子！而常维翰落入匪巢的经历使得他始终无法与妻儿团聚，却将赵家、孙家以及宣贵昌一家的关系纠缠得愈加紧密。当我读到赵秀祺竟然是宁德功在赴任途中搭救的小女子时，读到赵莺因失恋投河被孙善救起，孙善竟是匪首孙亮的儿子时，我真有“伸展到了脱臼错位”的惊异感。然而王雨不愧是专业的医师，他可以从容地将“脱臼错位”接榫得不露痕迹。巧合使得《填四川》的故事非常紧凑，也非常具有吸引力，当然巧合在这部小说中也不仅仅是为故事讲得神奇曲折，它更有利于彰显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王雨最钟情的人物应当是宁徙，事实上所有的巧合都有一个向宁徙靠拢的向心力。在宁徙身上，不仅集中了移民们的种种艰难和智慧，也凝聚着移民们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作为一位女性，她更是充满了浓厚的爱心和善良。王雨最具颠覆性的构思是他让百年之后的“常氏祠堂”的正首高悬宁徙老人的画像，而宁徙的两位丈夫以及他们后代的画像则分列在两厢。在传统的家族文化中，女性始终只能是配角，王雨显然要打破这一传统观念，他不仅要将宁徙置于家族祠堂的首位，而且认为宁徙是一个非凡之人，因此她的肉身也会留下舍利子，让后代景仰。赞颂女性和母亲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但像王雨这样，从家族和创业的角度来肯定母亲的价值的还为数不多。可以说，《填四川》在叙述上完全采用了传统的传奇方式，但在主题表达上则站在现代性的高度。

王雨的叙述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读《填四川》时，总是联想起巴蜀的摆龙门阵。摆龙门阵就充满了传奇色彩，蜀渝之地的人似乎天生就想象力丰富，善于把平淡日常之事讲述得神奇非凡。浸润在摆龙门阵的文化氛围之中，王雨也许就更乐于以传奇化和戏剧化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了。其实，好好研究一下蜀渝之地摆龙门阵的文化习俗，倒是对解决当代小说想象力贫乏的弊病大有帮助。而对于蜀渝之地的作家来说，摆龙门阵是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他们应该多加珍惜，深刻体认，自觉地化为自身的劣势。不知道王雨是否也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摆龙门阵，但他还可以从摆龙门阵中汲取到更多的营养。比方说，摆龙门阵讲究绘声绘色，但王雨在这部小说中的叙述基本上是一种记述性的叙述，缺少描述性的叙述，如果他能适当地加入绘声绘色的描述，相信小说会有更加强的感染力。

以传奇方式再现历史

□贺绍俊 谭飞菲

王雨的长篇小说《填四川》再现了清末的一次重要的大移民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湖广填四川”。据说当年康熙皇帝颁布《填川诏》，此后的140余年间，有800余万人的移民大军充实行到蜀渝大地，蜀渝的繁荣显然是与这次大移民分不开的。像这样的历史大事，恰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最好证明，但这样的历史大事似乎在正史中少有详实的记载，因此王雨的这部小说担当起了彰显其历史意义的功能。过去我对“填四川”的移民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为此我要感谢王雨。当然，王雨写的是小说，其人物和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我们无须去考证小说是否确有其事，但我们在类似于《四川民俗史》等地方史志中发现他们的影子。这样做，更加凸显了这段历史是一种人民性的历史，也更加凸显了这段历史所蕴含的精神价值。

很欣赏王雨对历史的文学化处理，他是以传奇方式再现历史。传奇是中国传统文学讲述历史故事的一种基本形态，由此也培养了热爱传奇故事的传统审美习惯。王雨在构思《填四川》的情节时更多地沿袭了民间传奇的方式，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采取了传奇化、戏剧化的处理。小说以西蜀的常维翰和宁徙夫妇俩移民填川的遭遇为主线，编织出一个个跌宕起伏、奇巧丛生的故事。故事几乎纵贯于填四川大移民的百余年间，展示了大移民中拓荒垦田、创业发家、匪患成灾等方方面面的图景。大移民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场景，在现代小说叙述中一般都是采用多条线索平行并置、全方位的散状或板块结构，这种结构气势恢弘，像一幅全景图，但它比较松散，缺少聚焦效果。王雨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通过传奇化和戏剧化的方式使故事集中在西蜀土楼一起长大的常维翰、宣贵昌和宁徙身上，因此小说有些类似于家族的故事，但小说并没有因为是家族的故事而局限了视野，这得益于小说中一系列的巧合、悬念等戏剧化的情节，从而使得本来互不搭界的人物和事件都汇聚到几个主要人物身边，而家族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一个开放性非常强的故事。可以说，王雨是以一个巧合接着一个巧合来延续他的故事的。巧合，是传奇中常用的发展情节的方式，其实，无论中外，古典小说是离不开巧合的，比如在狄更斯、哈代等英国古典作家的创作中就有大量的巧合情节。当年一位评论家曾非常赞赏夏洛蒂·勃朗特运用巧合的方式，风趣地说勃朗特已经“把巧合的长臂伸展到了脱臼错位的

2

何谓好的小说，首先需要知道何谓文学。实际上，文学的现代含义才不过两百多年，其本身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约翰·艾里斯曾经论证说，“文学”就像杂草一样，杂草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植物，而是只因出于某种想要除掉的任何一种植物。“文学”意味着某种相反的东西：它是人们出于某种理由而赋予其高度价值的任何一种作品。因此，“文学”只是一种功能性的概念，它并不像昆虫存在那样存在着。小说同样如此，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在16世纪末与17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中，“小说”一词似乎同时被用于真实的和虚构的事件。中国小说的观念也经历了由古代的“补正史之余”的真实到现代的“想象性”的虚构的转变过程。不过，正如我们谁也不会把电话簿、菜单、病历当做文学一样，能够当做文学来欣赏的文本一定是可以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所以，乔纳森·卡勒总括以上两种不同的视角指出，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理解成为具有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看做程式的产物，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哪一种视角也无法成功地把另一种全部包括进去。所以你必须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即所谓的文学，就是文本的自身性质和外部对文学的看法、需求、评价这二者复合关系的一种体现。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也应在这两种复合关系中建立自己的边界和存在依据。

所谓好小说的标准，其复杂程度不亚于谈论何谓文学或何谓小说的问题。我们或许以文学经典为标准，认为符合文学经典的从小说为好的小说，但问题是文学经典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异往往大于共同性，依据文学经典进行的写作大都沦为拙劣的模仿而遭